



梁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所，於中大前校長金耀基教授題字的「結合傳統與現代 融會中國與西方」書法前留影。

比較及公眾史學課是中大歷史系深受專業人士歡迎的碩士課程，筆者有律師朋友和傳媒朋友攻讀，都大讚得益匪淺。而當初為香港引入這熱門學科的人就是梁元生教授——他擔當橋樑，引進美國公眾史學正統，兼採中西事例，在香港發展出這門糅合歷史與現實、融會傳統與現代的學科。跟梁教授訪談，他常自言是「Man of in Betweenness」（不落二邊、存在於兩者之間的人，簡稱「之間人」），這個「之間」的概念更貫穿其學術成就以至人生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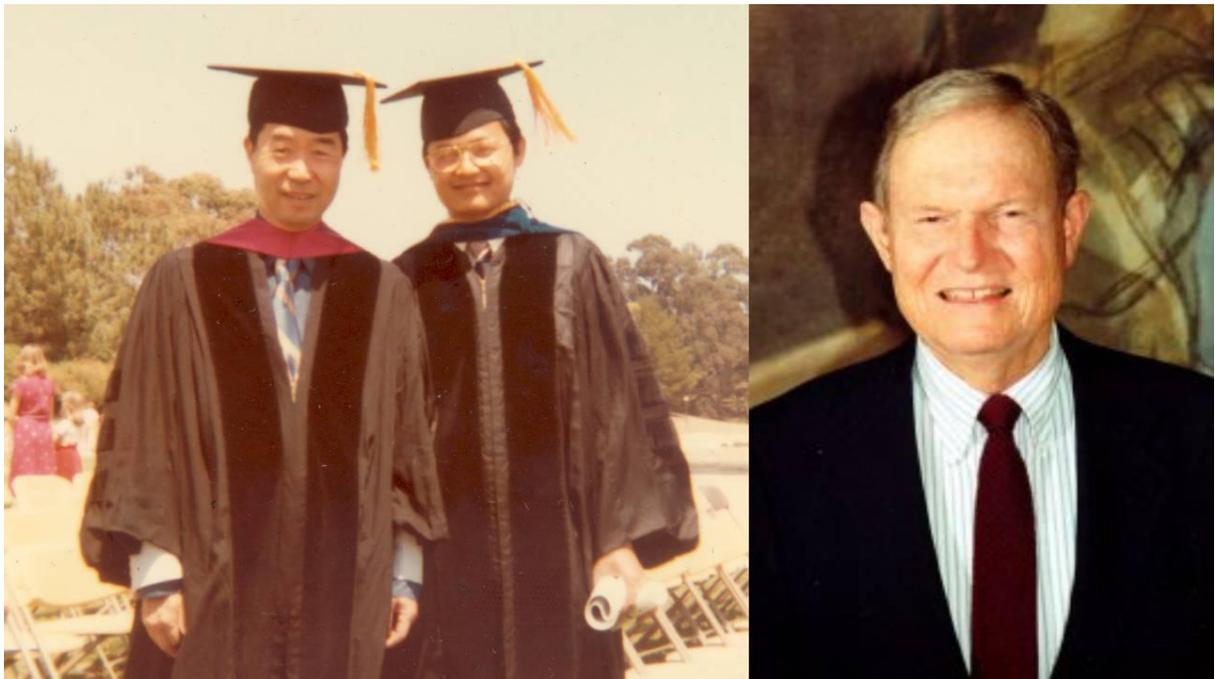
遊走中西文化、學術與應用之間： 赴筴美國成公眾史學創始人助教 為中國引入新治史方向

「因為我自己都是關心現實的人，現實就是社會如何生活，如何學一些自己認為有意義、有價值的東西。」梁教授這樣解釋他對公眾史學的興趣。冥冥中或者也注定由他將公眾史從美國引入中國，原來他跟美國公眾史學先驅羅拔·凱利教授（Prof. Robert KELLEY）淵源甚深，

70 年代末在美國當研究生時，正正是大師幾個助教之一，因此常有機會跟這位公眾史學創始人交流，而那時候剛好就是凱利教授創立和積極推動公眾史學之時期。

「我跟他相識是因為教書…」梁教授細說與凱利教授的相處點滴，「他平時跟助教相處時常常會提起公眾史，鼓勵研究生投入 Public History 範疇的研究。他積極推動這個研究方向，又跟我們分享一些想法，說『這些是當代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展』」。

梁教授憶述，凱利教授私下常常強調公眾史的現實應用，就如他在《公眾史學家》（The Public Historian）創刊號所言，希望課程的培訓有助畢業生未來在職場專業崗位發揮所長，「學了歷史，有些方法和知識可以應用的」，他認為在政界、商界、法律界、博物館、檔案管理等領域內都有可供歷史學家發揮專長之處。



梁教授（中）與其博士論文導師、著名歷史學家徐中約教授（左）
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合影；美國公眾史學先驅羅拔·凱利教授（右）

大概在凱利教授的耳濡目染下，公眾史學的種子早埋藏在梁教授心底，並在 90 年代末中大歷史系面臨收生及經費不足時發芽。前系主任蘇基朗教授曾公開這麼說：「幸虧從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回來的梁元生教授，他推介了母校的 Public History 課程。」據說就是梁在課程改革會議上提出了這個重大發展方向，後來課程茁壯成長，學生不乏政界、商界鉅人，不單扭轉中大歷史系急劇萎縮的危機，更吸引內地不少學府紛紛向中大取經。這算是不負前輩期望，成功將這門學科發揚光大了吧？但梁教授不願居功，只淡然說：「這是很多同事一起討論的結果。」

Public History 翻譯成「公眾史」而非「公共史」，背後也有深思。梁教授解釋：「選擇就是公共與公眾吧！我們認為是以人為主，因為『公共』牽涉的是一個概念式的問題… 當你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，『公共』(的概念)是很重要的，但如果我們研究民眾史、研究人的歷史，那當然是『公眾』會好一點。所以我常覺得這課程很強調公眾，即社群(Community)，是關乎社區的歷史。」

關心現實也不忘史學傳統： 醉心史料研究 日看數小時舊報縮微影片

作為「之間人」，梁教授關心現實的同時也不忘史學傳統，皆因史料讓他着迷。「我以前在新加坡教學之時是每天數小時伏在案頭看那些縮微影片，即舊報紙的編微膠片(microfilm/microfiche)，後來自置一部二手機器讓自己可以在家裏看。」梁教授侃侃而談沉醉於海量史料的樂趣，筆者本來對歷史興趣一般，但聽他這麼一說，突然明白那些厚厚的史料恍如一條開啟時光隧道的鑰匙，讓史學家恍如置身古代。

梁教授特別提到舊上海的報章《教會新報》和《萬國公報》，他興致勃勃地說：「史料是吸引的，看到當時的人是如何報道，當時的人寫甚麼… 那些人報道的是當時發生的事情啊！例如船期、興建第一座發電廠之類，這些就是當時民眾有興趣的東西。」「以前你要等一星期才能看，現在還可以一口氣看下去呢！」

這兩份報章的靈魂人物就是梁教授碩士論文主角林樂知，是林的史料牽引他對上海史越挖越深，「上海史算是我的老本行，最核心的研究就是放在上海史，而這是偶然的。因為我的第一本書是寫林樂知，林樂知就是在上海，他在上海有 57 年時間那麼長… 我本來沒打算研究上海，只是因為他在上海…」。梁教授如今是上海近代史的權威，由上海社科院前副院長熊月之教授主編的《海外上海學》中，「名家剪影」章節有專文探討他對上海學的研究和貢獻，當中特別讚揚他「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研究視角，以『聯繫人』作為分析上海道台的立腳點，從而使書中包含的內容顯得異常豐富」。

提出「聯繫人」的研究新視角： 以嶄新角度及比較史觀研究中國近代史

梁教授是第一個提出以「聯繫人」角度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，《海外上海學》形容「這與那種純粹的官制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」。那他這個嶄新的概念從何以來呢？他說靈感來自澳洲土著在殖民地政府下所擔當的角色，「我是第一個這樣寫的人… 那時我在看一本有關澳洲歷史的書，發覺有些土人專門被安排充當 Linkage Man (聯繫人)，我看了就覺得這個對我的研究很合用啊」。

而這個「聯繫人」觀念就是梁教授現在常說的「之間人」雛型，他解釋：「我給道台一個觀念叫 Linkage Man，如何連繫呢？第一是中央官員與地方關係的中間人、另一是西方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的中間連繫人物，最後就是商人與文士、仕紳中間的連繫人物… 這三個（層面）分別就是地方史、中西交流史和政治行政史。」

這種「之間」的相互連繫也有助其比較史觀的形成，他熱衷比較香港、上海與新加坡的城市文化和發展，他解釋：「研究三個城市就是要將比較、連繫層面放進去… 看她對不同事物或外來衝擊是如何應對的，這就是透過比較。而比較可以平行發展的，即大家沒有互相參照的… 另一個則是相連的，即連繫性的層面，那一定是大家有交集的。看商人的交集、移民的交集，甚至消息，例如你看到一個電報的網絡… 這些都會令這些城市有很大的互相影響，例如出版。」

說到出版，有個人一直縈繞梁教授心頭：商務印書館英文部前主任鄭富灼。「他本是一個台山仔，然後赴美留學 23 年… 餘生在上海做很多翻譯和商務（印書館）的工作，引入很多英文書。現在已沒多少人知道了，以前所有中學生、大學生讀的英文課本都其實出自他那兒。」梁教授如數家珍般細說鄭的生平，原來他已研究對方逾 25 年，「我認為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人，將英文、將西方知識透過讀本傳播，在他們的那個時代，有多少人會讀英文？但有他以後就人人都讀了，因為有了教科書」。

研究對象折射自己人生態度： 「之間」概念貫穿個人成長與學術貢獻

梁教授承認揀選研究對象時，除了受到史料牽引，研究的題目或者也折射了本身的人生觀。「我跟進了鄭富灼二十多年這麼長時間，我也思考，他的人生值不值得我花這麼多時間…我覺得這些人物的生命與我們關心的東西有連繫，或者與我自身的經歷有連繫。」「我覺得我研究甚麼人物呢？可能就是背後的概念，就像剛才所說的『之間人』，你為何感興趣呢？原來他是共享你的人生態度，慢慢發覺自己研究的那些人都是 somewhere in between (存在於之間的)。」

這一點，可能與梁教授自身經歷有關。他小時候常常搬家轉校，11 歲已在新界 9 個地方住過，「我在天水圍、元朗墟、東頭村去到火炭、拔子窩、大圍然後去到上水，上水住古洞，之後才到吉澳的」，他最記得當年在東莞學校雖然只讀了半年，但深得老師歡心。他自小深得師長器重，筆者聽聞中大以前幾間書院各自為政，他就讀時卻竟自由穿梭於三所學院之間，「三個系主任我都認識的，我入了崇基，那崇基那位羅球慶主任教了我四年；新亞的孫國棟主任則聘請我做研究助理… 聯合的劉偉民主任跟我認識較久，關係亦很深刻」。

及至在中大任職，他一直有多重身份，除在歷史系任教及曾當系主任之外，亦曾兼任文學院院長、崇基學院院長、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、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要職，遊走於各專業領域之間。而學術研究方面，「之間」概念明顯是其治史核心——他一直在中國與西方、歷史與現實、傳統與現代之間探索，都是跨地域、跨學科和跨時段的課題。他對「之間」的哲學有一套精闢的見解，他強調，中西文化交融絕不是中西方各佔一半，他闡釋：「中間是只有 Middle Way (中道)，中間是很窄的，In Betweenness 就是，嘩！大到不得了，總之就是在這兩個邊緣之間就可以有很多地方。」這套哲學也可以應用在人生取捨上，他說：「這釋放了自己，就不用走走一條那麼窄的路。若只有中間、中間只有一條線般走得那麼辛苦啊！但你身處之間就海闊天空了。」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版權所有。All Rights Reserved. Department of History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